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GUANG YANG



4
1960



廣 揚



1960年第4期(总第193期)目录

1960年4月25日出版

- 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利用
 宗教侵略、颠覆我国的一切罪恶阴谋！……雁北 (1)
- 斩断美帝魔爪，严惩间谍分子……曹道生 (9)
- 各地神长、教友纷纷集会一致谴责反革命叛国分子
 和间谍分子的罪行…… (11)
- 庄严的国法，正义的制裁……李伯渔 (13)
- “罗马教皇制”是人为的政治产物……李德培 (14)

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
 罪行，肃清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

-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无穷
 灾难……严实 (26)
- 帝国主义的缩影——富成功……侯景雨 (39)
- 罗马教皇是文化艺术的敌人，是进步人类的
 死对头……曹道生 (41)
- 三个“可怕的教皇”……长安 (45)

月 刊 (每月25日出版)

编辑兼出版者：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

订 阅 处：广扬月刊发行课

(天津市和平区西宁道9号)

每册1角 半年6角 全年1元2角

(外埠平寄不加邮费 挂号另订)

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颠覆我国的一切罪恶阴谋！

· 雁 - 北 ·

上海市人民司法机关对美国间谍华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公判，获得了全国广大教友、神长及其他宗教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各界人民的积极支持。这显示了我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的团结一致，也显示了我国人民坚决进行反帝斗争的巨大威力。美国间谍华理柱案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的公判，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罗马教廷长期以来安插在中国天主教会的这个反革命据点已被彻底摧垮，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颠覆我国的阴谋，再一次地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全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全国爱国的神长教友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一切控制的斗争的伟大胜利！

(一)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罗马教廷是我们的死敌！

美国间谍华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是美帝国主义图谋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策应蒋介石匪帮复辟、以达其长期侵略我国的阴谋的一个主要环节。

世人皆知，罗马教廷是一贯地为反动剥削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效劳德、日、意法西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后又投向了美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在實際上已經成了美帝國主義用以侵略全世界和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陰謀的得心應手工具。

不容諱言，我們中國天主教會，歷來是被帝國主義控制和利用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長期侵略我國，除了脅迫蔣介石賣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以外，並通過羅馬教廷控制了整個的中國天主教會。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下，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進行了許許多多的罪惡活動，舉其大者：前羅馬教廷駐蔣介石匪幫“公使”、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曾借“巡視全國教務”之名，煽動全國各地神長、教友協助蔣匪進行血腥的反革命內戰；美國派來的大批所謂“傳教士”和假慈善為名進行政治陰謀活動的“美國天主教福利會”，則滲入各地教會攫取領導權；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田耕莘等和反革命戰犯于斌，更是一南一北，一唱一和地竭盡全力地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公開叫囂美帝國主義應對我國實行軍事占領，壓迫奴役我國人民。一九四八年，當着中國人民革命全面勝利的大局已定，蔣介石匪幫的反動統治面臨徹底崩潰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羅馬教廷為了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又派遣了以從事顛覆活動而臭名遠揚的樞機主教史貝爾曼來我國進行陰謀活動。這個帝國主義分子來到我國後，他一面與蔣介石匪幫保持着密切聯繫，到處以“祈禱”、“講演”為名策動反共反人民，鼓勵蔣匪繼續進行反革命的“勘亂”戰爭；一面又假“巡視教區”為名，搜集我解放區機密情報的間諜活動，積極策劃反革命的“應變”部署，圖謀在解放後，繼續利用我中國天主教進行顛覆活動，破壞我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

披着“主教”外衣的、一貫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危害我

國人民的老牌間諜華理柱，便是跟隨着臭名遠揚的史貝爾曼一塊來我國的。間諜華理柱與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組織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局”（對外叫“教務協進會”“G·C·B”）這個反動機構，便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羅馬教廷所策劃的反革命“應變”部署之一。間諜華理柱在充當這個反動機構的秘書長期間，直接控制這個反動組織，為了圖謀達到策應美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匪幫復辟的罪惡目的，進行了一系列的破壞活動（具體罪惡事實見三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及各省報）。

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叛國集團，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羅馬教廷為了破壞我國人民革命事業進行顛復活動的產物。這個反革命叛國集團的成員，是一小撮受帝國主義分子長期豢養並依靠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而獲得特權的洋奴走狗。他們大都出身於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制度有着刻骨仇恨。如叛國集團的頭子龔品梅，就是川沙縣的惡霸大地主。一九四八年，在前美國駐蔣幫大使館和羅馬教廷駐蔣幫公使館的直接指揮下，由“天主教中央局”召開的所謂“公教教育會議”上，美國大使館參贊麥爾畢親自到會指示：天主教要協助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打倒共產主義”。在龔品梅積極影響下提出一個反動提案，要蔣介石把全國訓練師資的師範學校的教育權，全部交給反共最力——由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分子所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會，以協助美帝和蔣匪訓練所謂“動亂反共的師資”。又如罪犯金魯賢、朱洪生、朱樹德、王仁生等，在解放前都曾去美國、羅馬、法國等地，受過一系列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訓練；罪犯金魯賢、王仁生曾出席過在凡爾賽舉行的國際反共會議；罪犯金魯賢還在西歐考察過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羅馬教廷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復活動的經驗；罪犯蔡忠賢、張希斌，都是早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時就利用

宗教为日寇服务的汉奸，蔡忠賢更在解放前夕奉帝国主义分子之命去香港受过反动訓練，美帝侵略战争爆发后就被帝国主义分子指派回国策应美蒋复辟。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成員，尽管他們披着什么“主教”“神父”的外衣，但他們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叛国活动罪恶事实（見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及各省报）証明他們实是一群背叛祖国、臥賊作父、絲毫沒有中国人气息的敗类。

事实証明，美国間諜华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羅馬教廷圖謀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策应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匪帮复辟的产物。由此可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羅馬教廷是我們全体人民的死敌。

（二）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澈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羅馬教廷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新的破坏謀阴！

（1）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羅馬教廷利用宗教侵略、顛复我国的事实再一次告訴我們：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我們的反帝斗争就不能絲毫放松。从华理柱間諜案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公判后美帝国主义的无耻叫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它在垂死絕境里还要加紧各种阴謀活运。美帝国主义不仅正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手法，而且許多迹象証明，它还在加紧利用天主教来进行破坏；据說：解放前逃跑的叛徒田耕莘等和战犯于斌已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羅馬教廷的指派回到台灣，协助蔣匪帮进行危害祖国的阴謀活动；朗卡里登台以来特別加强了对我們伟大祖国的攻击污蔑和阴謀活动，它不仅于去年西藏叛乱分子叛乱后，发出过无耻的叫囂，而且还在研究如何利用宗教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和策划反共反社会主义、敌視新中国的阴謀；被我們赶跑了的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間諜，現尚在香港等地从事破坏新中国的

陰謀活動，等等。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時刻戒備，絲毫不
能麻痺和放鬆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必須深
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把這一運動進行到底，徹底清除美帝國
主義及其走狗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思想影響，粉碎一切帝國主
義和反動派的陰謀詭計。

(2) 披着宗教“畫皮”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進行破壞活動的事實告訴我們，“主教”、“神父”、“修士
”、“修女”等宗教外衣和“講道”、“祈禱”等宗教活動形
式，不僅便於掩蓋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
豺狼本相，而且也易使我們虔誠的教友和神長受騙。龔品梅反
革命叛國集團所以敢於在上海及全國各地猖狂地煽動教友反
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因為他們披上了宗教外衣，把一切反革命活
動都說成是“為了宗教”。他們利用“神權”、“教規”、“
講道”等欺騙教友，利用宗教興風作浪，使不少人受騙上當，
中了他們圈套。美帝國主義和國內外反動派所以要利用宗教，
羅馬教廷所以被帝國主義所賞識，其原因就在這裡。因此，為
了有效地同一切披着宗教外衣的敵人進行鬥爭，我們必須堅定
愛祖國愛社會主義的立場，經常加強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學習，
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和識別是非善惡的能力，提高政治嗅覺，
對一切東西都要用腦子想一想，用鼻子嗅一嗅，用眼睛看一看，
看這些東西對黨對社會主義是有利還是有害，凡是有害的就要
同它作堅決的鬥爭。特別應當注意的是那些最容易使我們受騙
上當的披着宗教外衣的人，必須注意他們的言行並根據對黨對
社會主義的利害標準進行鑑別，好者近之；壞者就採取措施進
行鬥爭。這樣才能使自己免於上當，並能有效地防范與孤立、
打擊敵人，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

(3) 國內的反動派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破壞和我們有些

神长教友上当受骗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旧中国天主教长期被帝国主义利用；我们很多神长教友大都受过帝国主义的直接栽培和奴化教育的影响，思想深处染受了不少的毒素。这些毒素影响如不彻底清除，就很易受披着宗教外衣的国内外敌人的蒙骗蛊惑而中其阴谋诡计，有些神长教友受骗上当、被坏分子利用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了深刻接受这一教训，免受利用，除了提高警惕、戒备之外，还必须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留给我们的毒素影响，必须彻底摆脱梵蒂冈的一切控制，坚决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打破一切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和幻想，才能有效地同国内外一切企图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的敌人作斗争并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为此，我们必须彻底清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罗马教廷利用宗教侵略，颠复我国和欺压我国人民的罪行，把反帝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三) 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加强政治思想改造，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来回击国内外一切反动派！

目前我们国家的形势极其良好。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取得了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整个六十年代持续跃进的基础。最近，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不仅总结了我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而且展现了伟大祖国的光辉美景，显示了六亿人民的雄心壮志。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今年生产继续大跃进而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在各个生产建设方面都呈现着欣欣向荣的灿烂景象。

面对如此美好的形势，我們爱国的教友和神职人員都为之欢欣鼓舞。我們每一个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都为生活在伟大的毛澤东时代而自豪。特别是上海人民司法机关对美国間諜、华理柱及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公判，使我們更加感到祖国的伟大庄严。对于美国国务卿赫脱的无耻叫囂，美国間諜华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滔天罪行，只能激起我們的无比愤怒，我們一定要把对敌人的愤怒化为力量，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繼續大跃进而奋战不息，用实际行动来回击国内外反动派利用宗教进行侵略顛复和叛国活动的阴谋。因此：

(1) 我們坚决依靠党，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这句话我們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披着宗教外衣的阶级敌人，所以仇視党、誣蔑党、反对党，是因为它們知道：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和幸福的根本保証，因为有党的领导，它們侵略、压迫、奴役我国人民的企圖便不能得逞。它們竭尽其造謠、污蔑之能事来反对党，挑撥我們神长、教友与党的关系，其可耻目的是显而易見的，也是我們从切身經驗中受教育最深的。現在我們醒悟了，决不再上那些国内外反动派的圈套了。我們一定要靠攏党，听党的話，“一边倒”，倒向党的怀抱。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問題上，我們都毫不动摇地服从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并且像保衛自己的生命一样地保衛党，同一切危害党的言行和坏人坏事作无情的斗争，以打击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破坏。

(2) 加强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和生产实践；加强政治思想改造。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飞躍发展的伟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自然面貌、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面貌都在迅速地

改变着，而且变的很快。我們神职人員和修士修女，經過党和政府几年来的耐心教育，思想觉悟同过去比較进步不小，但是还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还必须繼續不停地进行政治立場和政治思想的自我改造。过去我們这些人，所以会被帝国主义、反革命所蒙蔽利用，是和本身的剝削階級立場、受帝国主义毒素影响深、政治觉悟低、思想不純分不开的。我們应当記取这个教訓，糾正过去的錯誤，深入进行反帝爱国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学习，要学习領会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精神实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策，联系实际提高觉悟；同时，要經常参加体力劳动，要有向工人階級学习的精神和毅力，并且經常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坚持不懈地在劳动实践和政治斗争实践中进行自我改造。

(3) 积极为实现一九六〇年国民經济的繼續大跃进而斗争。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經济計划草案的报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报告中所提出的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9年增长23%，鋼达到1840万吨，增长38%，煤达到42,500万吨，增长22%和粮、棉各增长10%左右的宏伟指标，鼓舞着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为完成和超額完成这个伟大任务而奋勇前进的毅力和决心。我們全体神职人員、修士、修女和广大教友，必須在这场伟大的生产建設斗争中同全国人民一样拿出献身的精神，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崗位上和各項劳动生产的实践中，参加到“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中去，投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洪流，积极貢獻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用苦干、巧干、实干的精神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向六十年代的第一年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献礼，并用以回击国内外反动派；

斬斷美帝魔爪，嚴懲間諜分子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付主席 曹道生

三月十七和十八兩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后宣布了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十四名重要案犯和美帝国主义間諜分子华理柱的判决，我和全国神长教友一样，对这个庄严的判决，表示衷心的拥护。

大量的事实証明，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帝国主义間諜分子华理柱，是外披羊皮內藏狼心的法利賽人，是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共同策划的、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叛国集团和間諜分子。龔品梅叛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在这个美国老牌間諜分子华理柱的直接指揮下干出来的。他們搜集我国政治、軍事、經濟等情报，送給美国間諜特务机关和羅馬教廷；窩藏包庇国

民党特务邓家俊等反革命分子，为地主藏匿大批契約，妄圖策应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蔣匪帮的复辟；破坏抗美援朝，阻止青年教友参军；禁止教友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破坏和平运动并以各种手段破坏中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等等。罪恶极为严重。他們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天主教会的敗类。我国司法机关予以国法制裁，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情。这既斬断了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魔爪，剷除了禍国殃民的叛国分子和美国間諜，保衛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也保障了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宗教信仰自由。

我国司法机关对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严正审判和懲

处，再一次沉重地打击和有力地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图谋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由于打中了它们的要害，粉碎了它们的计划，而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那一帮反动头子便心疼若狂地大叫大嚷起来。美国国务卿赫脱厚颜无耻地亲自出马为他们的阴谋卑鄙伎俩作辩护，发表所谓“声明”。说什么华理柱的“唯一使命是宗教性的”，他呆在中国不走，是“对他的天主教教友的精神福利的献身精神”，真是胡扯八道，瞪着眼睛说瞎话。华理柱的使命既是“宗教性的”，为什么搜集我国修建军用机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部队的人数、装备、作战、防空措施及我国国防建设等重要机密情报呢？这些情报与“宗教”有什么相干？与“天主教教友的精神福利”有什么用呢？如属于宗教活动，他们又为什么在活动中使用密码、写密信呢？足见华理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分

子。而赫脱在他的无耻“声明”中一点也不敢触及事实，真是作贼心虚，以此遮羞罢了。

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充分地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正当的宗教活动，一贯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反革命活动自由，是绝对不能混同的两回事。不拘是那个外国人，也不拘披着什么外衣，只要违犯了中国人民法律，中国人民司法机关有一切权利给予应得的惩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任何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的法律尊严，决不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同样，中国人民的法律决不让间谍分子和叛国分子得到一点方便。赫脱的无耻调言，只能更加证实了华理柱的罪行是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一贯图谋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活动中的一个环节。也更加暴露

了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反动本質和腐朽面目。

这一案件深刻地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进一步擦亮了眼睛，更清楚地認識到羅馬教廷一贯利用天主教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反动本質，使我們更加坚定起来，徹底摆脱它的一切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大道上繼續前进。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和羅馬教廷

是不会从失敗中吸取教訓而甘休的。它們愈临近死亡，愈要垂死掙扎，我們天主教神长教友更要保持百倍警惕，严防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利用中国天主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切阴谋，我們一定要把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为保衛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到底。

拥护政府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团案和

美國間諜華理柱案的嚴正判決

各地神長、教友紛紛集会一致譴責

反革命叛國分子和間諜分子的罪行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团和美國間諜華理柱兩案的消息公布后，河北省唐山、献县、邯鄲、石市、保定、清苑、涿县、曲周、宣化、张家口，四川省重庆、雅安、瀘州、万县、宜宾、康定，河南省郑州、安阳、滑县，陝西省藍屋、三原、汉中，湖北省襄陽、江陵，福建省漳州、廈門、邵武，广东省广州市、梅县、汕头，广西梧州，湖南芷江以及貴阳、太原、合肥、济南、烟台、沈阳、长春、哈尔

濱、呼和浩特和海南島海口市等地省、市爱国会和教区于三月下旬紛紛召集神长、修士、修女和教友代表集会座談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案的判決。与会者憤慨地譴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梵蒂岡利用宗教进行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陰謀，声討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背叛祖国和美国間諜华理柱危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一致痛斥美国国务卿赫脫为华理柱辯护、开脫美帝顛复陰謀的罪責的可耻叫囂；紛紛表示衷心拥护政府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判決。

各地神长、教友在座談中指出，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是在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岡的陰謀策划下組織起来的，是美帝国主义与梵蒂岡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又一具体罪恶事实；为了回击美帝国主义及梵蒂岡的可耻陰謀，一致表示坚决彻底摆脫梵蒂岡的一切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針。长春市赵惠中修女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根子是梵蒂岡，現在政府懲办龔品梅这伙叛国分子还不能算完，要坚决斗争到底，砍断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梵蒂岡的魔爪。”

各地神长、教友在座談中討論彻底摆脫梵蒂岡的控制时，认为必須改革教会的反动的封建剝削压迫制度，認真遵守国家的各項政策法令。沈阳徐振江付主教提出：“要繼續廢除教会內的一切陈規陋矩，进一步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加强政治思想改造，为彻底摆脫梵蒂岡的一切控制而斗争！”

各地神长、教友表示：坚决服从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認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劳动鍛煉，改造自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不少地区爱国会在座談后通过了決議和声明。

莊嚴的國法 正義的制裁

陝西藍屋教區主教 李伯漁

三月十九日，我們閱讀了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美國老牌間諜華理柱受到了上海中級人民法院的公正制裁的消息後，感到萬分興奮，一致認為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是對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又一次沉重的回擊。我們藍屋教區神職人員和教友衷心擁護人民政府這一的英明措施！

自從我國人民民主政權建立以來，美帝國主義處心積慮，無日不在與中國人民為敵，而梵蒂岡也竟充當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幫兇，共同策劃種種陰謀，指示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勾結美帝國主義間諜華理柱，積極破壞我國各項政策法令，鼓吹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秘密組織反革命集團進行特務訓練，企圖顛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這種滔天罪行是我們全國人民和廣大愛國神長教友堅決不能容忍的。

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在三大敵人的壓迫之下，常期抬不起頭來，而中國天主教會的大權也完全操縱在帝國主義的手中，始終不能獨立自主。解放後，中國天主教會隨着全國人民的解放，才得重見天日，廣大教友在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鼓舞下，展開了轟轟烈烈地反帝愛國運動，使中國教會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控制，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但是龔品梅之流對於這點却恨之入骨，公開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百般迫害和打擊愛國的神長和教友，甘心充當帝國主義的走卒。然而愛國的神長教友，政治覺悟不斷提高，在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及時揭發了他們種種陰謀破壞活動，使這些反革命分子，終於沒有逃出人民法網，終於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制裁。

“羅馬教皇制是人为的政治产物”

——李德培——

多年来，因着帝国主义的和我们的偏信，一向认为罗马教皇是耶稣在世的活代表，但通过研究后，在历史材料中，清楚地看出罗马教皇制是纯粹人为的政治产物。在圣教会初期，根本没有教皇；其后，因着君主帝王的扶植，并经过争权夺势的斗争，造成了罗马主教的优势，因而逐渐形成了后世纪的所谓“罗马教皇”。

一、天主教在五世纪以前

根本没有所谓“教皇”，当时主教们的权利全都平等，从以下几方面的史料可以得到证明：

1. 第三世纪圣师们的言论。加尔太基的西比廉主教是三世纪的著名圣师。几次加尔太基公议会全是由他主持的。当253年高尔乃里当选为罗马主教时，西比廉写信祝贺。信中称他为“同僚”，称他的职位为“主教职”。并没有一字一句表示高尔乃里的地位高于一切，有管理全教会的权柄〔1〕。当斯德望一世为罗马主教时，罗马与加尔太基之间，关于“异端”人的付洗有了严重的分歧：以西比廉为首的加尔太基方面，认为“异端”人的付洗不妥当，必须重洗；而以斯德望一世为首的罗马方面则说“异端”人的付洗照样妥当，不必再洗。256年春，关于这个问题，在加尔太基召集了有61位非洲主教参加的会议，众皆

〔1〕赫利恩著：“教会通史”，1857年，巴黎版，卷12，613页。

认为各地主教有权力各行其是，不能受其他主教的限制。这时罗马的斯德望竟以绝罚作恫吓，并对西比廉施以更严重的处分和压力。256年9月西比廉在加尔太基召集了主教扩大会议，会议中全体主教们拥护西比廉的主张，而把斯德望置之不理。会后，西比廉向罗马的斯德望提出抗议书说：“可爱的兄弟（西比廉称之为兄弟，而并没称之为至圣圣父——编者），为了我们大家共同地位的利益，根据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和友爱，我们把会议的决议报告给你；我们确信因着信德和虔诚的启示而作出的决定，也一定会引起你在虔诚和信德热忱方面的兴趣。再者，我们很晓得，任何人也不愿意放弃其先入为主的成见，但在其他问题上，与同僚们仍能保持通常的来往。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对任何人未作争辩，也未作出任何律条。因为每一主教，都能自由按着个人意见管理自己的教会。”〔1〕因为

问题未得到解决，接着斯德望一世与西比廉和非洲主教们肆行谩骂。斯德望把西比廉写成“伪教徒”、“伪宗徒”、“詭詐的工作者”；而西比廉说斯德望“如何的心瞎、败坏、愚蠢和顽强固执！”加巴多西凯撒肋的主教非尔米良把斯德望比作“负卖主的茹达”，“粗暴奸佞的税吏”。〔2〕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1）加尔太基的几次宗教会议都是由非洲主教主持的，会前并未征求罗马主教的同意或派代表来参加；（2）西比廉和非洲的主教们并未把罗马主教看作上司，只当作同僚看待，甚而互相谩骂；（3）西比廉和非洲以及小亚细亚主教都认为主教们彼此平等，在管理教会方面有个人的自由，别的主教不能侵犯。

〔1〕向上书，卷12，958页。

〔2〕哈弗莱著：“教会会议史”，1908年，巴黎版，卷1，176页；“公教百科全书”，1913年，伦敦版，卷4，586页。

2. 四至五世紀大公議會的決議。在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議會的條文中，虽有

“茲規定君士坦丁堡主教，在羅馬主教之后，有首席的榮譽，因君士坦丁堡是新兴的羅馬首都”，但這絕不能說成是羅馬主教有首席地位的憑證，因為既然說是榮譽，就不能是實權，况且條文內“之后”二字，希臘教父解釋為“時間”的先后，而不是地位的先后。故此，當時羅馬、君士坦丁堡、亞力山大府三地主教都在積極競爭這优越地位。451年的加爾才東會議，在28條中，重申了君士坦丁堡會議關於君士坦丁堡主教與羅馬主教平等的規定：“……教父們把這些（主教）特權授給舊羅馬聖座，因為它曾是皇帝首都。以同樣的理由，150位主教同意新羅馬——君士坦丁堡應享受和舊京城一樣的特權，因它也是因為國王和議院的所在地而獲得榮耀”。〔1〕

3. 近代“神學家”的看法

。近代神學家党格來在他的著作中也不得不這樣說：“無疑地在聖教會初期幾個世紀內（五世紀以前）科學地、道理地證明不出羅馬教皇的元首地位，同時也未嘗實際而普遍地施行過”。〔2〕党格來本是維護羅馬教皇元首地位的教權派，而能作出這樣的肯定結論，這就更證明我們所說的五世紀以前，教會根本沒有教皇，完全是歷史事實。這個事實的本身有力地說明，“教皇制”不是耶穌立的。那末它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

二、教皇是政治產物。羅馬主教變成教皇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可以說是從312年君士坦丁進羅馬就開始，直到1439年第十七次大公議會才算確定。其成功的原因：一是皇帝的扶植，二是歷代教皇的能爭善奪。

〔1〕哈弗萊著：“教會會議史”，卷2，26頁，815頁。

〔2〕党格萊著：“基本神學”，1945年，羅馬版，478頁。

1. 皇帝的扶植。皇帝为什么要扶植羅馬天主教呢？简单地說，尚在实行着奴隶占有制的羅馬帝国，到公元四世紀的时候走上了沒落的道路，在經濟上出現了日益衰退的現象，在政治上則有日趋瓦解的形勢。殘酷剝削的奴隶占有制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而構成羅馬帝国組成部分的民族和部落，又都竭力地要从这个統治集团——羅馬帝国摆脱出来；再加上“蛮族”部落及其同盟者随时随地都有侵入的可能，这不仅使帝国的統一受到威胁，而且使它处于岌岌垂亡的地步。帝国的統治者，为了挽救垂死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巩固帝国的統一，一面积极加强軍事独裁的政权，一面利用新兴的宗教——天主教，因为天主教虽然在初期是被压迫者和不幸者的宗教，強調平等、反对富貴；但从二世紀以后就渐渐变了質，竟主张对統治者須恭敬馴順，被剝削压迫者須忍耐屈服，并且极力提倡和維護专

制政体和财产私有制。这正迎合了当时統治階級的心理，于是天主教由被压迫的境地，在历代皇帝扶植下，逐渐成为奴役人民群众的工貝。

第一个扶植和利用天主教的君王是君士坦丁的父亲奥古斯多·葛乐录。他认为，为了維持和延长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国家的統治，政治的压力和教会的訓誡两者是同样必須的。故在刁克来卡奴司、賈肋略、馬克西棉三人共同迫害教会时，而他却于311年在自己的領土內，取消了迫害教会令，以此大大获得了天主教徒的拥护，使得他的儿子君士坦丁312年在米乐威桥之役，借天主教徒的力量，打败了較他强大的馬克桑其伍，占領了羅馬。君士坦丁在进入羅馬后，便大力扶植羅馬主教和羅馬天主教会，313年頒布了所謂米蘭敕令，宣布天主教会为“合法宗教”，許可信仰自由，贈給教会大量土地和財富，并給予了种种方便，将拉特蘭宮殿賜

給羅馬主教，并以巨款資助羅馬主教及其所屬神職人員的生活費用。君士坦丁之所以如此支持羅馬教會，完全是出于政治的策略。他在統一了西部帝國之后，決定向天主教徒比較多的東部帝國發展。他很熟悉，兩年前，他的父王取消迫害令，并未惹起非教徒的反感，反而鼓舞了天主教徒为他作賣命的斗争，取得了意外的勝利。那末他繼續这样做，也不会失掉非教徒的信心，同時還會把東西方天主教徒都拉攏過來，作為占領東部的資本，豈不微妙！于是君士坦丁和軍事的進展一起把“米蘭敕令”推行到東部帝國各地，這樣他又巧妙地利用了天主教會的“对上講服從，對下講統治”的精神，很快地打敗了李西尼伍和馬克濟米奴兩個政敵，統一了羅馬帝國，穩穩當當地作了全羅馬帝國的皇帝。此后的羅馬皇帝和貴族們也給了羅馬教會不少的權利和財富，從此，在歷代皇帝的扶植下羅馬教會日益

財多勢大，而羅馬主教的地位也扶搖直上。〔1〕

2. 羅馬主教的能爭善存。

從三世紀以后的羅馬主教多是出身于名門貴族和政治野心家，他們繼承了祖先的陰險狡詐，運用了各種卑鄙的手段來竊奪一切能夠竊奪的權利，他們日夜思念的是怎樣把自己建立成為世界上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其結果在天主教會內，產生了所謂“教皇”。下邊我們要敘述羅馬主教怎樣奪得了“教皇”的權位。

羅馬城的主教，一方面受到羅馬城——帝國的經濟、政治中心的影響；一方面依附皇帝君王的勢力，即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關係，逐漸形成了優勢。當時有勢力的主教區：東方有亞力山大府、凱撒利亞、安地約基、君士坦丁堡；西方有羅馬、加爾太基。

〔1〕蕭若瑟著：“聖教史略”，1932年，獻縣版，卷8，90頁；湯姆生著，陳受頤等譯：“西洋中古史”，1938年，商務印書館，29頁。

凱撒利亞因為是帝國政府代表的總部，凱撒利亞的主教就成為巴力斯坦和敘利亞的總主教；亞力山大府對於埃及和里比亞也是如此，但因為地理、政治、經濟各方面不及羅馬，這幾個總主教的權勢，也就趕不上羅馬城的總主教。羅馬主教便借着這種優勢來奪取教會的統治權。〔1〕

教皇良一世(440—461年)是其中最激烈和最陰險的一個。他聞知加爾才東會議有“新羅馬主教享有古羅馬的特權”的規定，竟然偷偷在尼賽大公議會的付本中增入“羅馬教會永占優越地位”一語，并據此反對加爾才東會議的決定。但終於被加爾才東會議的代表們發覺，希臘文的尼賽公議會決議中，並無此語，而是拉丁本篡改加添的；故當羅馬代表在加爾才東會議上讀此條文時，曾激起了與會主教的爭辯和反對。〔2〕會議上終究通過了新羅馬主教享有古羅馬的特權的決議。但良一世看到通過宗

教形式不能實現他統治全教會的野心，就轉變方向來投靠西羅馬皇帝，請求皇帝以君主的權力把他置于西方教會的至高無上地位上。455年皇帝瓦蘭提年三世出了一道諭旨，要所有的西部主教都臣屬於羅馬主教，并且令所有帝國的官吏強迫主教們遵從這個命令。五世紀後半期西羅馬帝國將滅亡時，良一世利用西歐政治長期的混亂并乘皇帝彼此爭奪的機會，派遣許多傳教士到阿雷曼、佛里茲、薩克遜人里去宣傳天主教，以擴張勢力。同時，還拉攏了“蠻族”領袖阿提拉和占賽利克等以鞏固其優勢地位。從此，羅馬城主教勢力日強，財富日增，逐漸成為西歐的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這時他開始稱他是伯多祿的唯一“合法繼承人”。〔3〕

〔1〕湯姆生著，陳受頤等譯：“西洋中古史”，1938年，商務印書館，42頁。

〔2〕同上書，43頁。

〔3〕“公教百科全書”，1913年，倫敦版，卷9，156頁。

額我略一世时期，教皇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良一世后，又经过十八个罗马主教，到額我略一世(590—604)。他即位之初，首先将兵权攬在手里，以“总司令”自居，把世俗人员逐出拉特蘭宮，尽行录用神职人员，以巩固他的統治地位。为了利用政治力量，提高他在教会內的权势，事事屈服于皇帝权威之下。他曾这样说过：“君王之所行，合乎法理者，我們必然随从；如不合乎法理者，只要沒有我們的过错，我們依然接受”。他进一步以伯多祿繼承人自居，强迫西方各教区承認他的絕對权力。因倫巴底人的侵入，无数的难民麇集羅馬，額我略便乘这个机会，用剝削压榨取得的金錢財物，救济难民，收买人心，抬高个人的声价。虽然如此，他的权势仅及意大利半島及其附近地区，其他地区額我略的势力是达不到的。至論东方教会虽然在理論上同西羅馬是一家，但东部已經是另一个

帝国，另一个教会，和西方政权、信仰实际上已不相联属了〔1〕

教皇們在借助王权获得对西方教会的統治权后，更进而攫取对各国君王的統治权。从額我略一世以后，教皇的政治野心愈来愈大，不但要統治全天主教会，而且要統治世界上一切的国王。他們竟用卑鄙殘暴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817年巴斯加一世任教皇时，先表示与王室亲近，路易的儿子洛代耳結婚时，他派遣欽使携重礼去致賀，并于823年給洛代耳加冕祝聖他为国王，想以此实现教皇权駕諸法蘭克皇室之上的阴谋。但法蘭克皇室則想使教皇受国王的支配，因此相互之間发生了冲突。法王派遣两个高級官員代奧道路和利奧进入教廷坐鎮操縱一切。而教皇却指使手下人将代奧道路和利奧弄瞎害死〔2〕。827年，額我略四世繼位当教皇，翌年，他

〔1〕同上書，卷6，782頁，785頁。

〔2〕同上書，卷11，514頁。

指使高尔比的院长瓦拉在爱克司會議上，为教皇的无上教权，作了强詞夺理的辯論。829年，額我略郑重宣布教权高出一切教会以外的政权；833年并拿出伪造文件来証明他有干涉欧洲政治的权力。〔1〕他干涉法国内政，参与了虔誠路易王室的父子爭权斗争，竟身临陣头助战，帮助洛代尔以武力夺取他父亲的王位。他曾兩次参加了廢黜虔誠路易的謀划，并明令廢除路易的王位，并要挾路易非承認教会有任免皇帝的权力，不給他复职。875年教皇若望八世，給查理举行加冕礼时，公然宣称皇帝是由他一手造成的。当时皇帝們为了抬高自己的声价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求教皇給行加冕礼，而怀有政治野心的教皇便借此作为攫取政权的手段。〔2〕

十一世紀中叶，羅馬教皇曾一度失去威望隶属于皇帝的政权之下。德皇亨利第三随意任命德意志主教当教皇，尽力提高教皇的威信，为能作他皇

室的捍衛者。但是被他安放在教皇宝座上的良九世却乘机宣傳教权应高于政权，教皇不仅是教会的主宰，而且应成为皇帝的主宰。待至希尔布蘭即額我略七世（1073—1085）当教皇时，这种趋势表现的更为猖獗。他是一个极权政治野心家，魯莽地肯定教皇高于一切的特权，无情地敕令教士們恪守独身主义。他的特权主张主要地包括在他的所謂“教皇遺敕”內。今簡要摘录几条如下：

第二条：只有羅馬教皇应当称为天下共同的（君王）。

第八条：只有羅馬教皇得用帝徽。

第十二条：羅馬教皇有廢黜皇帝之权。

第十八条：教皇法令任何人不得取消，而教皇能廢除任何人的法令。

第十九条：任何人不能审

〔1〕“西洋中古史”，237頁。

〔2〕“公教百科全書”，卷6，789頁；“西洋中古史”，276頁；劳巴盖著：“教会通史”，1851年，巴黎版，卷15，510頁。

判教皇。

第二十四条：人民經教皇指令或許可能指責其君王。

第二十七条：教皇有权力廢除人民对暴君的誓約。

額我略七世以其特有的狂热毅力定要实现他的主张，使西欧全部居于教皇权力控制之下。他根据伪君士坦丁捐贈契約和查理大帝給哈德良一世的“捐贈契約”，自命为意大利的統治者。借着保祿宗徒曾到西班牙布道的傳說为由，把西班牙做他的屬国；因为匈牙利国王斯德望曾“把匈牙利奉献給伯多祿，”因此他就成了匈牙利的統治者；596年奥斯定会曾到英国傳教，也就把英国列为教皇的屬地；496年因为克罗維斯信奉天主教，法国也成了教皇屬地。依他的主张，撒克逊、俄国以及其他不皈依天主教国家在被征服后，都应臣属于教皇。

額我略七世对全欧洲固然抱有野心，而对德国更显得囂张。1074年他任意将一些德国

主教罢免，說这些主教的任命不合法，是賄买来的。1075年更狡猾地利用德国内战的机会禁止德王用俗人任教职的特权。而德王亨利第四則用自己的权力委派了許多空缺主教来对抗，并且鼓动了二十六个主教，宣称額我略的当选无效，并以皇帝名义叫額我略下野，从教皇的宝座上滾下来受万世的咒罵。額我略馬上以伯多祿的口吻下令罢免亨利的王位，并处以絕罰；此外，他更煽惑德国臣民背叛亨利，禁止臣民服从他。这样額我略激起了以德国大貴族为首的新内战，大貴族們也停止了亨利的职权，并拥护路德福为德国皇帝。亨利迫不得已，乃亲自越过亞尔卑斯山到加諾沙迎候額我略，穿着懺悔衣，在雪地里站立三天求額我略的赦免。1080年額我略再次声明廢除亨利，并处以絕罰，而德国皇派主教們在亨利主使下宣布廢弃額我略另立貴柏特当教皇（克来孟三世）。1082年亨利第四进攻教

皇領地，1084年攻陷羅馬，額我略逃到聖安日姿，而貴柏特則為亨利加冕壯其聲勢。1085年額我略七世死於異鄉加西諾山。但教皇與德王的衝突並未終止。

其後，額我略的繼承人繼續同亨利四世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教皇巴斯加二世（1099—1118）一方面處亨利以絕罰，一方面鼓動亨利的兒子叛亂。亨利四世終於1105年被迫遜位，他的兒子亨利第五接位。父親在世時，他站在教皇一邊反對父親，但作了國王，却繼續父親與教皇作鬥爭。他沒徵求教皇的同意，就委任了好些主教。這個爭端直到亨利五世的至親加里斯多二世當教皇時（1119—1124），才告解決。他們於1122年訂立了所謂“窩木斯協定”，訂立了平分委任主教權利的新制度，主要的是：新主教的領地政權由皇帝授予，教會神權由教皇授予。〔1〕

十二、十三世紀的教皇運

用了破壞歐洲各國統一和在封建統治集團內製造分裂的陰險手腕，使教皇權力達於極峰。善於運用這種手腕的人要數依諾增爵三世（1198—1216）。依諾增爵三世是一個最狡猾，最富於政治野心和殘酷凶暴的統治者。他的政治綱領是進一步推行額我略七世的“無上神權政治”，他曾說：“我們被賦予一種使命來統治一切人民和一切王國”，“王權從教皇獲得光輝和威望，正如月亮從太陽得到光亮一樣”。為了迷惑天主教眾的信仰，使他們盲目地為其反動政治服務，他第一個宣布了“教皇是天主在世的代表”。依諾增爵三世時代，教皇的權力達到極點。他陰險地利用各國內部封建集團的矛盾和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以及對西歐各國皇帝加冕的手段來操縱政治，製造衝突，以擴張自己。

〔1〕“西洋中古史”，243頁；科斯敏斯基等著，朱慶永譯，“中世紀史”，1957年，三聯書店出版，188頁；勞巴蓋著“教會通史”，卷14，173頁。

的权利。当时，英王若望，德王弗賴代利克都不得不臣属于教皇，并向教皇奉献大宗貢品。其他如丹麦、阿拉岡、葡萄牙、保加利亞、瑞典、波蘭和阿尔买尼亞等国国王，也都承认是依諾增爵的屬下。〔1〕

教皇极权的衰弱。随着民族自主情緒的滋长，教皇的极权也逐漸衰落下來。十三世紀末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要求日益增长起来。十字軍失敗后，市民阶级兴起，国家的王权同时也漸漸抬头；中古理想的教会独尊形式漸漸被国王們打破，国王們都在努力将国内教会变为王朝的附庸，使它受王权的指揮，其中法国可謂实现这种政治的先驅。

法王非利浦第四开始限制法国教士的特权，禁止教士过問世俗司法，并禁止教士参加国会，紧跟着，为了偿还对英战費，向教士課征国稅。教皇保尼法爵八世（1294—1303）起而对抗，1296年以“教士教民”通諭，宣布国王无

教皇同意，不能对教会财产課稅，犯者即处以絕罰。而非利浦則禁止外国人入境，更禁止金銀財宝之类出口，以防止教皇势力的潛入，和断絕教皇从法国方面的收入以示对抗。1300年保尼法爵派使臣到法国抗議，而被非利浦逮捕。于是保尼法爵以“救世主”和“我儿知悉”兩道通諭，指責非利浦侵害教会权益，声明非利浦的法令无效，并坚持教皇高于一切的原則。这时非利浦在法国召开三級會議，保尼法爵在羅馬也召开宗教会議，互相申斥，互相謾罵；一方面声称国王为政治最高权力者，人民必須矢志拥护王权；而另一方面則确定教会权力高于一切，人之服从羅馬天主教，为得救是必要的。以后非利浦使用强力在阿那尼逮捕了保尼法爵。其后

〔1〕“西洋中古史”，288頁；“公教百科全书”，卷8，13頁；劳巴盖“教会通史”，卷17，1頁；“广揚”，1958年，第23、24合期，55—69頁；“中世紀史”，457頁。

虽被人营救，终致郁闷而死。

[1]

接保尼法爵位的是本篤十一世(1303—1304)和克来孟多五世(1305—1314)。他二人对非利浦第四不但作了讓步，而且在教会行政方面任非利浦的摆布。1309年非利浦为控制教皇，把克来孟多五世接到法国亞未农城。此后亞未农成为教皇所在地达70年之久。此70年內的七个教皇全是法国人，这七个法国教皇在法皇操縱之下一心一意为法国政治服务。同时，由于爭夺教皇权位还出現了两个教皇和三个教皇并存的大分裂局面，因此，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2]

从十六、十七世紀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潮泛滥全欧，到处掀起了反封建独裁的运动。教皇权力，教会财富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的打击。久为羅馬教皇所控制的意大利人民，对于民族独立的要求也日益高漲。特别是在庇护九世当教皇时

(1846—1878)，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統一运动。庇护九世便奋起作最后的掙扎。他于1870年在羅馬召开了梵蒂岡大公議會，并于1870年7月18日，在大会上勉强地宣布了“教皇首席地位和不能錯定为信条”，[3]目的就是为反抗意国收复国土，利用宗教形式企圖保持它的封建制度和它的統治地位。

根据以上簡略的事实，我們不难看出“羅馬教皇制”不是耶穌建立的，也不是什么从宗徒傳下来的，而是在历代皇帝扶植下，或历代所謂教皇用爭权夺利的手段实现的政治騙局。既然如此，它不是耶穌的代表，更不是教会的元首，它沒有統治全教会的权力。我們中国天主教会絕不再受它的欺騙和控制！

[1]“西洋中古史”，438頁；“公教百科全書”，卷2，662頁；
考巴盖“教会通史”，卷19，444頁。

[2]“圣教史略”，卷8，349頁；
“中世紀史”，512頁。

[3]“公教百科全書”，卷15，303頁。

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行，肃清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

帝国主义利用 天主教給我国人民 帶來了無窮灾难

· 严 实 ·

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利用“傳教士”对我国进行侵略是由来已久的，早自1582年（明万曆十年）就把作为侵略工具的天主教輸入中国。不过，那时还没有什么作为和发展。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因为鴉片战争失败了，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签订了“南京条約”，除須割地（香港）賠款（二千一百万兩），开放广州、厦門、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外，特在条約中規定給外国教士以傳教的特权，由是开创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公开掠夺我国的先例。接踵而来的是1844年（道光

二十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約”，其中首先規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設立医院、教堂。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了治外法权。同年，法国公使拉格来南与兩广总督耆英签订了“中法黃浦条約”，法国援“利益均占”之說，在条約中也强迫清朝政府接受“得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北犯，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約”，条約第十三款規定：“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身家……凡……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其后，“中美和好条約”于二十九款进

一步規定在华傳教特权。1860年（咸丰十年），法国得寸进尺，又与中国續約，在續約第六款复規定：“中国皇帝須出示“上諭”，如有对“傳教士”在各地“傳教”“講道”等进行絲毫干預者給以“应得处分”；同时，在下面又紧跟上“任法国傳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条。法帝国主义一不做二不休，又續上一条：中国官府应发还过去查禁的天主堂、学校、墾地……。

从此，帝国主义者仗恃洋槍大炮和“傳教士”充作特务間諜，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便更加殘酷起来。

随着洋槍大炮而来的“傳教士”，他們既有帝国主义作后盾，又有条約作护符，便如虎添翼，公开給帝国主义勾底綫，跑情报，搶占土地，建造教堂，給他們主子紮下侵略“据点”，在中国各地，他們搶男霸女、窩奸藏盜、拐騙丁口、草菅人命，真是无恶不作。后来，就連中国地方官的任免也

非由“傳教士”同意不可。另外，在帝国主义和“傳教士”豢养、蠱惑下的“教民”也来仗势欺人，例如，逼婚强嫁、誣良陷善、挑唆架頌、聚众斗毆……，屡見不鮮；故凡土棍、恶霸或犯有人命的，都爭先恐后地入教，他們“視教堂为利藪，以为一經入教，民間莫敢誰何，甚或挾教以修其私怨”（“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四，十三頁）。

自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弛禁天主教和咸丰十年法国条約进一步強迫清廷給“傳教士”以“傳教”特权以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被帝国主义和封建統治势力愈发压得喘不过气来，真可謂內憂外患，腹背受敌，生命财产系于一髮。但我国的劳动人民，头可断血可流；絕不甘外人的压迫和侮辱；他們反抗、斗争、同心御侮的火焰不断在全国各地迸发、燃燒起来！

一、“傳教士”很早以前就充当特务間諜侵略我国

天主教“傳教士”充当特务間諜侵略我国不仅是近百年来来的事。早在清雍正朝初年，福建福安县令发现在所属境内有“多明我”会士在私占地亩，大兴土木建造教堂，当即稟明閩浙总督满宝。满宝随即出示严禁在省內建造教堂；同时，上奏雍正：“西洋人杂处內地，在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徧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余俱安置澳門……”。雍正元年十二月壬戌（即1724年1月11日）旨下：“远夷位居各省，已历年所，今令其迁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勿使地方扰累，沿途劳苦”（“东华續录”）。雍正初年，各省之“傳教士”相繼被遣送澳門。

“教皇”本篤十三世听说中国驅逐了他的“傳教士”，殊为不安，遂即刻派出了加尔默罗会鄂达尔、伊尔方修士为“欽使”，于1725年10月到北京向雍正呈遞“教皇”璽書二件：“一为賀雍正登极之典礼，一謝先朝寵遇教士之隆情”。“欽使”对雍正阿諛奉承一番之后，跟着提出弛禁教和釋放因搞間諜而被禁押澳門的畢天祥、紀有綱的要求，但雍正严詞拒絕了。“教皇”之“欽使”見事不成，便悄悄溜走了。

雍正驅逐了散布在各省的“傳教士”，仅把在京供职的20人保留了。但这些人对他們同僚的被逐似不甘心，曾屡次表示不滿。因此，一天雍正召見了他們当中的召巴多明、馮秉正和費隱。雍正對他們說：“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入侵乱我百姓，蔑視我法律，福建长官来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接着雍正給他們指明那些被驅逐的“傳教士”来中国

的目的是“以道德为护符，而以捣乱（恐当时没有“特务”“间谍”之称——引者）为宗旨”，所以应该驱逐！同时雍正问他们：“试思苟我遣和尚喇嘛至贵国传彼等之教，尔等将何谓乎。”当时三个洋人默默不能作答。遂后，雍正又将“传教士”的阴谋进一步地揭穿了。他说：“尔等欲我中国人民尽为教友，此为尔教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传教史概论”256页）

雍正未将这20个“传教士”一併驱逐，这就给帝国主义的间谍网开了一面。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见仍有可乘之机，遂即改换战术，脱“传教士”的“传教”外衣，给他们披上修曆、繪画、葯师、御医、鐘表修理匠等画皮，于乾隆

朝大量申請到中国朝廷供职。当时載进賢窃得欽天监监正，徐懋德窃得监付；鑽在內廷繪画的有朗世宁，修理鐘表的有林济格，葯剂师是罗怀忠，充御医的是安泰……。

这些人博得乾隆的信任之后，就开始鬼域活动，到处搜集有关我国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重情情报，供給其本国政府。例如在朝廷內任翻譯的 Amiot（华名：錢德名，法“耶穌会”会士），于1781年9月28日、1785年10月28日、1776年9月15日，先后将大量情报发给法国国务大臣培尔丹(Bertin)、威夫尔(Vauvrière)等。法国政府为掩人耳目，将其中一部分作为“游記”公开发表了，但見不得人的一大部分，法国政府秘藏起来。1925年中国留法学生徐傳保无意中在法国巴黎国家藏书室內发现了上述被法国政府秘藏的部分情报，其法文名“Memoire des Jesuites de Peking”。1926年

月28日徐傳保在“大公报”发表“司馬法”研究一文的預注中称：“該书十三厚册，为十八世紀在华天主教‘耶穌会’教士所发至法国之报告所集成者，乃阿米亞(Arayot)教士手稿。其第七册乃‘研究’吾国兵书，以报告其祖国政府……关于此点，国人有何感想？”

(1926年9月28日“大公报”)其实“傳教士”借在京供职为名搞情报活动的事在1805年(嘉庆十年)就发现了：江西巡撫秦承恩在海关查获假冒在广东行商的陈若望携带文書(三件)地圖(一件)拟經由澳門傳遞外洋。陈若望并証物被解到北京軍机处，陈供称系受在朝供职的德天賜派遣。德天賜傳送外国的情报系用意文書写的，当时在京还没有能譯者。但那分地圖却看得清楚：一张詳細的中国地圖，特別从山东登州府等地至直隶广平一带标有許多奇形怪状的符号。德对此事企圖掩护，但終不能自圆其說。軍机处遂奏报朝廷：“德天賜写

寄地圖情节始終含糊，难保別无隐情，請旨将德天賜革去頂戴(当时朝廷为示“怀柔远人”之意，曾賜德以六品頂戴——引者)，交刑部詳細研审”(“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一，二十頁)。最后朝廷旨下：将德天賜解往热河，在厄魯特营房圈禁。給德天賜傳送情报的陈若望被发往伊黎。自从德天賜傳送情报案发生后，朝廷对于供职的洋人不得不警惕起来，及至下一朝——道光朝，欽天监再不复用西洋人。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进行間諜活动的縫隙被堵住了，因此，它們又考虑了輸送特务間諜——“傳教士”的第二个方法：潜入。

如果翻开嘉庆朝的“清代外交史料”，記載最多的案件只有并駕齐驅的兩大宗：一是帝国主义往中国內地私販鴉片；一是帝国主义往中国內地大量潛送“傳教士”。当时帝国主义往中国內地販私鴉片可以逃避高额的关税，可以掙大錢

，而潛送“傳教士”則其不然：不僅當時不能獲利，且往往“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但在中国查禁森嚴的時候，帝國主義敢冒死進行這一嘗試，絕不是偶然的。它們早就看到：往中國輸入鴉片，毒害中國人的肉體，顯而易見，亦早為中國人深惡痛絕，但輸入“基多代表”“福音使者”——“傳教士”一旦成功，其效則遠為鴉片所不及，況且沒有輸入鴉片那些顯著的缺點。

嘉慶十年，兩廣總督那彥成、廣東巡撫孫玉庭捉住了潛入的“傳教士”，立即向朝廷報告：“山西陽曲縣教民李如即亞在香山縣屬澳門地區接引西洋教士若亞敬潛赴內地，……若亞敬剃頭另服，裝作內地人民，一路捏病，躺臥艙中不起。五月初七日至韶關，……恐關役盤查……若亞敬上岸由僻路遠過韶關等候。”但一過韶關，這個特務間諜就被群眾發現扭送官府（“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一卷，三十二

頁）。以後，類似情況更多了，每天都有緝獲。例如，一個原名費思（法籍）華名李多林的“傳教士”已在三十年前於四川被逐出境，但始終未肯遠去，一直在中國邊境上窺探，伺機再行潛入，但一直沒有得到相當的機會，最後就不得不冒險潛入。他到廣東後化名徐德彰，剃頭，另服，又兼能操流利的四川話，便由廣東、雲南僻路潛入四川宜賓與原來的老關係接綫，但不久也被捕了。再如同期的一個意大利籍名蘭圖勒哇若岡乃斯的“傳教士”化名蘭月旺，由廣東潛入，深入到陝西漢中，後又輾轉江蘇、湖南數省，向來是穿內地人民的服裝，且留着一根小辮，鬼鬼祟祟，到處搜羅情報，繪地圖，後終於湖南耒陽境內被捕。這些特務間諜雖然有很多為中國官府所捕，但畢竟還有人得以逍遙法外。特別是“在江南……因有許多河港可以以船為家隱匿其中也”（“中國傳教史概論”256頁）。“傳教士”

一般的特务活动率皆如上，兹不多赘。然而猖狂、严重的早期“传教士”的间谍活动，莫过于1884年后中法战争发生以前。那时法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略越南的战争。河内失陷后，法军节节北上，战争烽火燃至澜沧江畔。我国云南、贵州、广西边界吃紧，法国不断增加舰艇，在我国沿海边界往来窥探，并闻法军屡攻兴化，不久中国东南沿海全线处于战争紧急状态中。此时，一切居于军事要冲之地的帝国主义“传教士”都异常活跃起来。广西巡抚徐延旭忽奏报朝廷：“教堂勾匪滋事，法人窥犯北宁”。随后，上思州知州张塏稟忽报：“上思州教堂三处徒党繁多，平日行踪已极诡秘，近则遣人四探；修坚房；勾引匪人执军械出入无忌，不服盘查。本月初五日，有教士马若望、周绍良来自欽灵，輜重甚多，并不许人过问，形迹愈觉可疑……闻主教富于道，有阴

带悍匪赴援河城……”；忽奏：“查上思州接壤越南之广安省……法人不得逞于北宁，……到处勾引教民为铤而走险”。又忽闻：“朱强涌教堂……逼近十万山，入教徭民甚多，海阳、广安皆由此道暗通消息”……（“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卷九至十二）。“传教士”给法帝国主义传递情报的奏章有如雪片飞来。朝廷遂嘱各路军队援南，坚守边境；李鸿章也布置了沿海防务。但无奈内有大量潜入的“传教士”为接应，大量输送情报，越南北圻失守后，法军旋攻我国东南，与“传教士”里应外合，我国南部的许多城镇便为法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一、十二）。不久又有浙江定海各教堂“伏奸藏炮”的警报（见薛福成“浙东筹防录”）。自此，沿海及边疆地区的教堂相继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公开的“据点”。

二、帝国主义借“教案” 残酷掠夺我国人民

清朝統治者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弛禁天主教以来，“教士”、“教民”在神聖的中国土地上日益橫行不法。他們海盜式的野蛮行为，引起极大的民憤，老百姓往往在复仇声中杀死“傳教士”，拆毀了“教堂”。但是帝国主义和“傳教士”就有所借口，动輒勒索千倍、万倍的“賠償”；中国劳动人民因此或遭冤獄，或被杀头；中国地方执事人員因所謂“防范未严”、“署处不当”而被戕为誅者亦大有人在。所以每一次“教案”发生，就是帝国主义与“傳教士”一次屠杀中国人民的机会，从而发一笔横財；每一次“教案”过后，“傳教士”的“傳教”特权也跟着便扩大一輪。

天主教弛禁以后发生的大小“教案”尚无精确数字，大約不下六十余起。最早的是咸丰六年的广西西林教案。此后

教案頻頻发生，如果翻閱同治朝以后的史料，会发现教案此起彼伏，隙不容髮。有时，在同时期內而在不同地区均有教案发生。这种情况說明，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不甘心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宰割；帝国主义者压迫得越甚，这种反抗愈激、愈烈，反帝的火焰遂騰云直上；遍地通明，到了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終于爆发了一次震撼世界的反帝斗争，即著名的“庚子事变”。在此期間，教案如此之多，不便一一叙及，只揀为帝国主义所津津乐道的几个談談。

帝国主义者所著中国天主教史之类的書籍中，都津津乐道貴州（青巖）教案。这个教案中的主要凶犯即法籍主教胡縛理（Faurie）。他是怎样的人呢？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貴州巡撫张亮基給軍机处的报告中說：“胡縛理偏袒教民，顛倒是非……指不胜屈。如上年冬間，貴定县民黃丙揚，偕妻庭氏，攔死李老大嬰孩，旋

即投入天主教內。李老大邀同案內十余人，赴黃丙揚家理論，黃丙揚声称：身已入教，告官亦不怕。李老大不依。正在吵鬧，黃丙揚之妻庭氏，手執鉄鋤，向李老大乱打。黃丙揚上前助毆。同去之十余人，各抱不平，將黃丙揚夫妇杀斃。黃姓尸亲，自知理屈，恐犯众怒，并未敢告发，胡縛理出头代訴……”但据张亮基等的报告中說：胡縛理“置凶犯李老大等于不問，而专归罪于李老大之房主不肯入教之罗国华。”胡縛理橫行霸道趾高气揚，张亮基的报告中說“官民望而生畏”，因而，“不屑之徒，无不恃入教为护符，以遂其任性妄为之計，故怨毒入人者深”。在另一份报告中张亮基还說：“自傳教之禁弛，……因有犯案始行入教，一經入教，拘提每难弋获，以故无賴之輩，趋之若鶩，人人恃为护符，甚至官場入教者亦不乏人”。胡縛理不仅如此压迫中国百姓，就連更官替吏亦在这“主教”

的权衡之下。例如：貴州署理民教事件之候补道蔡兴槐回籍，貴州巡撫张亮基报告朝廷說：“教民与汉民交涉各案，亟須遴員接办，非精明干練而兼为主教所欽佩者不能胜任，当即飭令署藩司曾璧光、臬司葆亨，偕赴天主堂面主教胡縛理、司鐸任国柱”。不料，这两位由貴州巡撫一再斟酌的“精明干練而兼为主教所欽佩者”亦遭到否定。胡縛理不同意张亮基提出的二人，特指定“已革按察使銜前貴东道多文、已革知府銜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汪維翰先行試办”。（以上引文均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一—五十八）帝国主义“傳教士”的凶橫霸道于此可見一斑。

1868年（同治七年）末，四川會阳发生了帝国主义指使教民进行的一个較大的凶杀案（帝国主义者叫“教难”），在法帝国主义分子范若瑟（主教）的慫恿下，教民聚众斗毆，一次杀死民众二百多人！当

地百姓再也抑制不住憤怒，遂不期而集，拆毀會陽天主堂，殺死了數名教民。范若瑟帶頭殺人盈野，自知理虧，遂取先發制人之策，即刻報告法國通商大臣轉告北京法國外交使節先向中國政府進行威脅，中國朝廷以為事關洋務，有條約當頭，趕忙調查，急速處理。經調查証實，死于群眾亂棍之之下的教民數名，法籍教士僅一名，而死于“傳教士”及“教民”的群眾竟達二百餘人之多！但腐敗的清廷為了“服洋人之心”却首先將會陽群眾劉幅等就地抵洋人之命，并認賠白銀一萬八千兩。帶頭殺死平民二百餘人的范主教因系洋人，中國“不便追究”；但另一帶頭行凶的“教士”覃輔臣是四川人，本應“按照條約由中國官嚴拿申明照例治罪”，但“據稱主教范若瑟已于七月回國，覃教士隨之而去”，所以就“相機妥籌”處理了（“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十九，二十二頁）。

當帝國主義“傳教士”在

四川會陽屠殺未了之時，貴州遵義的“傳教士”又有滋事。當時貴州巡撫曾璧光奉旨進行調查，然後回奏朝廷說：“遵查遵義民教爭斗起衅原委，實因教民楊希伯，于五月初五日，挾嫌滋鬧，糾約教眾入炎帝廟，將做會神壇經像全行打壞，維時看戲人眾，共懷不平，齊赴天主堂，將其經堂、醫館打毀”。事情發生後，曾璧光恐在此間的“趙司鐸、布司鐸”被民眾打死，遂派人將他們護送至省城貴陽。六月十三日趙、布被平安護送到省。七月初七日，貴陽法帝國主義分子任司鐸突然照會貴州巡撫謂“趙司鐸因被遵義民眾重傷，來省後身死，并已報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但曾璧光向朝廷的報告說得很清楚：在護送布、趙至貴陽一路上未見有何重傷，亦未有民眾重毆的事。在民眾拆毀遵義教堂的時候，趙曾越牆外逃，不慎有些閃腰，將他們護送貴陽的時候，趙已經痊癒。所以曾璧光確定

这里定有阴谋，遂马上指定贵阳知府胡超龙带刑件到天主堂詣驗。刑件到贵阳教堂后，贵阳主教說赵司鐸“业已殮殮浮屠”。为了辨明真偽，刑件要求开棺相驗，然帝国主义坚决不准开棺。

貴州巡撫張亮基把上述情况奏明朝廷，朝廷遂令湖广总督李鴻章等“持平办理”。

李鴻章尚在湖南沒有后程，法国付領事狄隆和主教梅西滿就找上門来厉声厉色地說：法国領事对畬阳、遵义兩案办結甚不滿意。同时立逼李鴻章承認賠款四万二千兩和接受五个条件：重办有关案犯（指中国百姓）；将畬阳地区制台調京审問；发遣畬阳“积貫作恶”之民和照“范主教所开清单賠补”以及“在范主教所理教务地方张贴条約条款”等。李鴻章这个卖国贼均一一应允“轉飭妥办”以后，“付領事狄隆、主教梅西滿”才有“意甚喜悅”的表情，并允代为回复大使关于川黔兩案能向中国政

府“照会完案”。

帝国主义从川黔兩案中发了一笔橫財之后，才勉强答应“完案”，但此时此刻，尚有湖北天門县教案、山西丰鎮厅教案、河南南阳府教案及广东九龙司等未結之案，帝国主义“正在借詞要挾之中”（“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九，一頁）；法帝国主义并給清廷一分非常野蛮的照会，从这分照会中，可以看出法国帝国主义貪婪无厭的海盜的嘴臉。

法国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南方有数省之官員及各該处紳士富豪通同一气，欺陵陷害傳教士及习教人，本大臣不得不派本国兵船到各处所，俾該处官員及劣紳富豪，悉按和約保护教务，以免后来各省傳教士及习教人再受欺陵陷害。揣思所有交涉教务未結之省分，一經兵船到日，該城官員及各劣紳富豪等，定知必无善状，接仗开炮，势所不免，必然立即愿遵和約会办。本大臣深知中国人习气，事过易忘，因想出一条

历久不忘之善法：凡法国兵船到处，必须该处官员及绅士富豪，至少每日供给兵船费用一千两，如此不但各省官绅历久不忘，以免法国兵船屡往也。现今已行文于本国水师提督，令其随事照办……为此照会。（“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二，五十六页）

从这分万恶的“照会”可见，当时的天主教会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摇钱树，天主教士和教民，就是帝国主义用以杀戮中国人民的屠刀。试想，“传教士”和“教民”有了这样的靠山，又怎能不如虎添翼呢！因此，“传教士”就横行不法，无恶不做，竟导致许多教案。其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传教士”在云南浪穹又犯下的更为骇人听闻的罪恶：

浪穹是云南边界附近的县分，当地人民一直饱受着“传教士”的凌虐。这里的法国“传教士”一个是“盛司鐸”，一个是“张若望司鐸”，平日窝奸藏盗，无恶不作。在浪穹

一带积恶累累的土匪李九、刘玉壶等，因官府到处严拿归案，无处藏身，便投到天主堂门下。当地人民群众为此愤愤不平，多次到县控告盛、张两“传教士”窝藏土匪，但县官恐触犯条约，向未敢深究。故此，李九和刘玉壶等更加猖狂起来，经常到外面给“传教士”拉抢妇女供其姦淫。

一日，浪穹县属下齐村余秋之妻余周氏被他们抢到天主堂里轮姦了。余秋闻讯赶到天主堂索妻，触怒了洋人，遂喝令将余秋打死。数日，有文大顺之妻文吴氏亦被张若望抢姦，文大顺前往要人，也被张若望等打死。光绪八年十一月间，浪穹天主堂本堂司鐸张若望又指使抢来吴大发的表姪女文张氏进行姦污。来年正月初八日，吴大发之妻吴罗氏与其女傅吴氏路过教堂，“当即被张若望与教民刘玉壶、李九、李杂货、李斗蓬、龙回子、刘豆腐等抢入姦淫。次日，吴大发向理论说欲告状，刘玉壶等即

說‘奉教人不怕官管’，斥吳大发吵鬧經堂，將吳大发吊打關禁，吳大发再三哀求始將夫婦釋回，其女傅吳氏仍關禁堂內”（“中法交涉史”卷五，十八頁）。第二天，吳大发到縣衙告發了張若望。縣官數次傳訊張若望，但拒不到官。張若望并四處聲揚：擬將吳大发打死。吳大发聞信后，迅速逃往后山，過了几天才敢回來，同時約了所有受害者家屬一齊到浪穹天主堂找張若望要人，他們站在門口要求釋放所有占姦的婦女，但張若望等不但不放人，且從牆洞里往外打槍，當即有十人斃命。來索人的人趕緊全躲開解散了。但當地群眾已忍無可忍，遂蜂擁而起，把浪穹天主堂拆毀，把張若望打死了。附近經常受害的群眾，又跑到鄰近的洋鼻天主堂點了一把火，這個罪惡巢穴也便化為灰燼了。法國主教古若望、付主教羅尼設恬不知恥地還向雲南總督提出“申訴”。

在此帝國主義不斷以教案

為借口擬派兵船開進各省的情況下又發生浪穹事件，不禁慌了朝廷的手腳，遂即勅令雲南就地籌款五萬兩賠修浪穹、洋鼻天主堂，另以“家屬撫卹費”的名義作為對張若望之死的賠償。同時，妻女被占姦，本人遭毒打的吳大发等均遭逮捕。據雲南總督岑毓英等給朝廷的報告中說，對於這些人“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明文”，最後只好按“刁民”罪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處理。至於其他妻女被姦污或本人被姦污丈夫被張若望打死的人“虽无杀人放火等情事”，但“因听从吳大发同行”，故均應按“被胁同行者杖一百例，各拟杖一百折責發落”或處以“杖一百，徒三年，定地折責充徒，限滿迭籍管束”等刑。（“中法交涉史”卷五，十七頁）……這就是帝國主義者和教內洋奴過去一貫散布的所謂“教難”的內容。

“邊疆公教社會事業”

（馮·麥克白克著）給“傳教

士”下了这样一个“結論”，說他們之入中国是“首先給中国輸进欧西好的貢獻，使中国人民得到更大的幸福。”但什

么是“傳教士”給中國人民輸进的“貢獻”，什么又是“傳教士”給带来的“幸福”呢，历史給我們作了最清楚的答复。

帝國主义的縮影——富成功

侯景雨

富成功（西名 Fabreques）是法籍“傳教士”，窃据保定教区第一任主教职，是地地道道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帝国主义“傳教士”打着“傳教”的招牌到中国进行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富成功就是一个代表。富成功窃得保定教区第一任主教职位后，由北京教区分得了一笔“庚子賠款”，便大肆揮霍，盖起了客厅，屋里屋外彩飾得富丽堂皇。

他出門坐抬轎，后因抬轎过时，改乘馬車。

他每下乡必先遣人去筹备，不鳴爆竹，不进村庄。迎接的人要一律叩头請安，否則必被申斥。

他为了污蔑中国人民，不断給修生照像，寄到外国。但是照像时必须打扮的穷气十足，丑态百出，以資“証明”中国人的“粗野愚昧和貧困”。每逢庆日或时局不安，即令在教堂門前悬挂法国旗，必要时还請法国兵前来“保护”。

有一次他曾邀請法国大使来保定，事先命全体修生衣冠整齐，到車站欢迎。大使下車全体請安致敬（单腿下跪），当时大家无不气忿填胸敢怒而不敢言。修生不許过問时事，不許談論时局，当然更不許談論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談及者，只許說法国胜，不許說法国敗。凡是有关爱国的話，都認成是罪恶。例如大修

生袁保祿因为說了一句“國籍主教快實現了”立即停止了聖品，險些被开除。

富成功蛮不講理，盛气凌人，視中国人都是“奴才”。一次他視查南关公教医院建筑工地与領班人談話，稍有不洽其意，举起手杖乱打，竟把手杖打折。然而对于中国的軍閥、統治階級就是另外一幅面孔。富成功曾不断和曹錕来往，彼此請客。他暗中和法国駐华

大使勾串扶植曹錕做了總統。当时也对法国立下了一次大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富成功是我們的一个凶恶的敌人，而富成功是代表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傳教士”，是它們的一个縮影”。梵蒂岡就利用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作爪牙，来奴役、剝削中国人民，試想我們如果不摆脫它的一切控制，那不是認賊作父嗎？

(上接第48頁)

· 沃拉代拉努斯之記述。我們知道，“耶穌会”士曾供給巴斯德大量伪造的历史材料，供他歪曲史实之用；布尔沙尔神父如果見到这种顛倒黑白的胡言乱語，定然会对这种卑鄙行为提出严正抗議的。

飽受“教皇”欺凌压榨的羅馬人民听說“教皇”已死，一呼百应，蜂拥而至，齐赴“教皇”甥侄門前去清算旧賬。大家用力拥开大門，庭院中煞时出現了一片楼台殿閣，无数

奇花异卉，真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繚乱，不禁为之一惊，然而他們明白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染滿了他們自己血泪，于是眼前的一切頓時变成了一片鮮紅的血痕，不由得怒从心起，一頓乱砸，最后竟把这罪孽的巢穴一把火燒了个淨尽。这时候樞机主教个个惴惴不安，躲在家中，把大門关得牢牢的，唯恐群众找上門来。这种情况一直到教皇依諾增爵 8 世上台之后方才結束。（未完待續）

羅馬教廷是文化藝術的敵人，是進步人類的死對頭

曹道生

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企圖依靠人類的愚蠢，永遠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橫行霸道的羅馬教廷，在迫害先進科學和反對新生事物的同時，並沒有放鬆了對文化藝術的摧殘，控制思想領域的擴大和發展。它這種蒙昧主義的統治，不僅阻礙了意大利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而且使歐洲各國的文化藝術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英國學者威克里夫（1320—1384），是牛津大學的博士，他把聖經譯成英文，使人民可以辨別它和教會的是非。這是對人民的一大貢獻，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歡迎。然而却冒犯了凶頑陳腐的羅馬教廷的愚民政策，遭到它的憤恨，並下令拘禁。生前雖未遭到羅馬教廷的毒手

，但它終不肯讓他的白骨安於黃土。1415年，君士坦斯大公議會決定，把他的遺骸掘發並焚毀，這個處分是由主教佛來銘於1428年奉教皇馬爾丁第五的命令執行了的。^①這充分證明羅馬教廷對進步學者和先進文化的摧殘行為，是怎樣地殘絕人寰了。

羅馬教廷對死者的殘忍尚且如此，對生者的迫害更不用說了。若望·胡司，是捷克天主教的一位神父，出身於農民，很熟悉農民生活。他編寫了語法，並創造了捷克人民直到現在還在使用的捷克語的書法以及很多藝術和政治文獻，因而遭到羅馬教廷的迫害。於1414

① 弗爾斯著：“世界文化史”，開明書店出版，333頁。

年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受审，用“异端”的罪名判处火刑，1415年7月6日在君士坦斯的一个广场上被焚殉难，并烧毁了他在一切著作，使捷克在文化发展上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①

羅馬教廷的黑暗統治也弥漫到埃及地区。在亞历山大府有一位女教师伊芭綺亞，她学識淵博，容姿美丽，名聞全国，繼承父亲（是有名的数学家）的教書生涯，教授青年数学和哲学。因为她很有学問而遭到羅馬教廷指揮下的修会会士的毒手，在415年3月，一群会士在街上向她攻击，把她拖到本城的大教堂——开撒里昂教堂，活活打死，并把尸首拖到刑場燒掉。②

羅馬教廷和反动統治階級一样，为了达到黑暗統治的目的，对民間文化和艺术采取了极其殘酷的迫害政策。羅馬教廷这种反动政策表现在反对戏剧的不断斗争中，这一斗争从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起采取了特別殘酷的形式。1649年，在某

些地方（如那伐尔）曾禁止戏剧演出，并且对在当地露面的演員加以迫害。③在古代波蘭各种民間仪式和游戏中，即包含了戏剧活动的因素。从这些活动中逐渐发展出了波蘭游蕩演員——流浪艺人的艺术，他們的演出遭到羅馬教廷的禁止和追究。④

羅馬教廷对民間歌曲和音乐也橫加干涉和迫害。查理大帝曾下令搜集过日尔曼歌曲，但是羅馬教廷却认为这是异端，要他儿子“虔誠路易”把这些歌集付之一炬。⑤它不但把劳动人民已經創造出来的歌曲狠毒地加以毀灭，而且对当时創作家和正在創作出来的歌曲

- ① 謝緬諾夫著：“中世紀史”，三联書店出版，246、252頁。
- ② 列夫臣柯著，包溪譯：“拜占庭簡史”，三联書店出版，43—44頁。
- ③ 苏联大百科全書选譯，“西班牙、葡萄牙”，三联書店出版，159頁。
- ④ 苏联大百科全書选譯，“波蘭”，三联書店出版172頁。
- ⑤ 湯姆生著，陈受頤譯：“西洋中古史”，下册，417頁。

和音乐，也加以迫害和排除。在十六世紀前半期最著名的重旋律音乐家莫拉列斯（1500—1553），除了宗教音乐作品外，还編写了世俗的音乐作品，并且准备按“西班牙特征”来写作，但遭到羅馬教廷的反对和排斥。①这些蛮横的措施，不但把劳动人民喜爱的、辛勤創作出来的音乐和歌曲排除殆尽，而且使西班牙的音乐和歌曲的发展受到了莫大的限制。

欧洲和意大利科学文化的一度衰頹，是羅馬教廷思想統治的結果。羅馬教廷企圖独攬新生一代的教育，公开地干涉教育事业。在波蘭宗教改革被鎮压以后，由于宗教裁判所的活跃，耶穌会分子决定着教育的性質和内容，在他們的教育活动中，蒙昧主义和黑暗势力达到了极点，因而使波蘭的文化陷于衰落。②十七世紀的学校，不屬主教区就屬修会，教育青年，完全是为教会的各宗派訓練馴服的爪牙。教皇額我略曾主张学校应当注意聖經和

神学等。修会学校教授完了粗淺的学科之后，便只有教授神学、聖經和說教式的文学之类。他們认为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道德”，栽培教士。③及至喀罗林时代的教育目的，仍然是要把儿童訓練成教士。其所以教天文者，只是为的使人能够計算月日先定的教会活动节期，根本不讓青年思想自由发展，或在科学文化上进行实际的学习和深造。④

法国学者伯多录·阿柏拉在巴黎創辦了不少学校，对法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他的教育精神和教学方法，不符合羅馬教廷的愚民政策，不久，阿柏拉被羅馬教廷殘酷迫害，在1140年的桑斯公議会上定了他的罪，教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譯，“西班牙、葡萄牙”，三联書店出版，148頁。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譯，“波兰”，三联書店出版，172頁。

③ 湯姆生著，陈受頤譯：“西洋中古史”，下册，395—396頁。

④ 同上書，396頁。

皇依納增爵第二焚毀了他的一切著作。

在西班牙、葡萄牙也是如此。自十六世紀五十年代中，宗教裁判所對科學文化思想採取經常壓制的政策。羅馬教皇和宗教裁判所判事官公布很多禁書目錄，其中列有當時最知名的學者的著作。耶穌會士把持大學各部門的講席，腐化青年學生的意識，建立他們自己的“文化科學”機關——反進步主義和蒙昧主義的養成所。建立在最大主教統治中心的各城市的大學，大多數在實質上只是傳授神學的学校，歸大主教和主教管理。人們把它叫做“大學修道院”不是偶然的。①

主教團（羅馬教廷機關之一）監督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出版，教科書的編寫精神是要人們聽從教會，與現存的秩序妥協，盲目地仇視一切進步的東西。他們所講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陳腐守舊而脫離實際的，進步學者最新的發現，在意大利學校中根本不加以

研究。②不僅如此，由於它對國民教育的操縱和摧殘，意大利的文盲日益增多，意大利絕大多數的農民是文盲。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居民中的文盲達到95%。③

羅馬教廷除了迫害科學家、文學家和焚毀先進科學和文化著作外，還對古代文學和藝術寶藏加以狠毒地破壞和毀滅，羅馬教廷指揮下的埃及神職人員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瘋狂，他們毫不留情地毀滅了古代文學和藝術寶庫，使世界文化受到巨大損失，在391年，著名的塞拉別穆圖書館就是提阿非羅主教受羅馬教廷的指使而焚毀的。④從此可以看出，羅馬教廷是文化藝術的頭號敵人，是進步人類的死對頭。

-
- ①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西班牙、葡萄牙”，三聯書店出版，101頁。
 - ②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意大利”，三聯書店出版，191頁。
 - ③ 弗·格·列甫寧科夫著：“世界近代史講座”，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18頁。
 - ④ 列夫臣柯著，包溪譯：“拜占廷簡史”，三聯書店出版，43頁。

三个“可怕的教皇”

· 长 安 ·

19世紀末，在巴黎出版了若望·布尔沙尔1483—1506年的一本日記。若望·布尔沙尔生于15世紀中叶，1483年开始在羅馬教廷供职，为“教皇”管礼节，死于1506年。在这个时期，先后换过三个“可怕的教皇”，即西克斯德4世（1471—1484）、依諾增爵8世（1484—1492）、亞力山大6世（1492—1503）。布尔沙尔神父日夜不离“教皇宫”，对这个罪恶渊藪中发生的种种丑事奇聞非常通曉。每当一日繁忙过去之后，布尔沙尔神父总要把日間見聞一一写进日記，无意中就写成了这本既真实又詳尽的“教皇”罪行录。

历代教皇犯下的种种罪行原是客观事实；而他們的孝子賢孙却唯恐“家丑”外揚，极

力掩盖。尤其自从特里騰大公議会之后，凡对教会統治稍有不利的言論和記述，一概列为禁書，应予焚毀。1558年9月7日，一貫勾結“教皇”殘酷屠杀进步人士的劊子手，西班牙国王斐理伯2世更发出諭令：“凡买卖或閱讀禁书者，一律应处以火刑”。然而这并未阻住某些历史事实仍在民間广泛流傳。19世紀，耶穌会的反动“教权派”历史家奉命負起了美化教会历史的任务，对教皇諸般罪行能掩盖的就掩盖，实在掩盖不住的，就輕描淡写，一扫而过，并且立即加上一番“解釋”。为此法国作家哀米肋·仄巴尔气愤地写道：“自吉沙尔旦（教会历史家——引者）直至晚近的教会历史家，皆如此，在他們的著述中充滿

了律师气息的辩护，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极力渲染，不利的一笔勾销，歪曲历史真相，甚至夹杂伪造、杜撰。”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沙尔神父这本严守事实、不折不扣的日记确可算作“劫余”难得的历史资料，下面将日记中有关上述三个“可怕的教皇”的轶事介绍一下。

一、西克斯德 4 世

教皇西克斯德 4 世原系某船户之子，后加入“方济各会”，从此渐渐发迹。1471年，“教皇”保禄 2 世死后，他不惜血本，用大量金钱买到了“教皇”位。西克斯德上台之后，一方面搜罗金钱，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又与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王国从事争夺。

西克斯德为了扩张领土，广捞财富，不忌任何卑鄙手段。他看中了托斯加纳的大片土地，遂生侵略野心。当时托斯加纳由麦第西族的兄弟二人罗兰和瑞连执政，住在首都弗罗

伦斯。巴西人素与麦第西族有隙，西克斯德乃串通了巴西人，以便从中用事，将麦第西族一网打尽，斩草除根。里斯城主教撒尔维亚底负责指挥暗杀。正当弗罗伦斯大堂举扬圣体的时候，他们动手了，瑞连当即被戕身死，罗兰见事不好，逃进了更衣所。煞时弗罗伦斯全城惊动，市民齐来捕緝凶手，主犯撒尔维亚底主教被群众吊死在窗口。西克斯德的外甥，17岁的拉斐尔·利阿利欧原来站在祭台侧准备行刺，群众一来，把他吓得浑身颤抖，连喊饶命，群众念他年幼无知，将他放过……。

西克斯德见自己策划的暗杀阴谋失败，不禁老羞成怒，下令将弗罗伦斯全城教徒一律开除“教籍”，并宣布此城为“禁止圣事地区”。当时群众和神职人员莫不愤愤不平，乃一致要求召开大公议会理论是非。西克斯德因而大为恼火，于是调来同盟亚尔风索·阿拉贡、弗利德利克·乌尔班平

托斯加納之“亂”。經過一番交涉，終歸和平解決，唯弗羅倫斯應派代表向“教皇”請罪。大家懼於“教皇”的武力，只得忍氣吞聲，接受了“教皇”提出的條件。

西克斯德這種蠻橫行為引起了整個意大利的反感，侵占托斯加納的陰謀失敗後不久，他又在盤算去侵略芬撒、拉維納、利米尼等地。1481年，他又勾結威尼斯人去攻占費拉爾，遭到了費拉爾大小諸侯的一致抵抗。最後西克斯德竟不惜荼毒無數生靈，製造內戰，挑撥歐爾西尼、高羅納以及撒沃納等幾大家族互相殘殺。內戰爆發後，高羅納族慘敗，其房屋盡成廢墟。西克斯德的侄子基羅拉莫·羅維爾乘機大肆搶掠，連樞機主教們居住的居里納宮亦被掠奪一空，並將高羅納族的樞機主教羅蘭索打得頭破血流，押進了聖天神堡。羅蘭索的弟弟法布利索聞訊，連忙去向西克斯德求情，營救自己的哥哥。西克斯德佯作依允

，把馬利諾碉堡騙到手中，却命人將羅蘭索在聖天神堡內院殺害了。屍體運到高羅納地區聖宗徒大堂後，死者的母親從棺材里取出了兒子的頭，舉起來向周圍的群眾哀切痛恨地喊道：“大家看吧！這是我兒子的頭，也是西克斯德干的好事！”聞者莫不潛潛淚下。

西克斯德之所以如此橫加掠奪，固然是他自己的慾望難填，更主要的却是想把这些賊贓分給自己的甥侄。濫用私戚在教皇歷史上已是屢見不鮮，不足稱奇，且隨教皇勢力之日益擴張而愈行愈盛，至西克斯德則更勝一籌。他共計有甥侄五人，都由他一手提陞為樞機主教。瑞連·羅維爾（後來的教皇尤利2世）總攬教會大權；伯多祿·利阿利歐原來不過是個“方濟各會”的小弟兄，舅父一作“教皇”，他竟搖身一變，成了君士坦丁的宗主教兼弗羅倫斯、賽維和芒德的總主教，從而擁有無數財產；然而兩年之後，伯多祿的財產就

被他的寵臣、愛妾、歌妓、詩人完全蕩盡，自身還落得債台高筑，終致窮途潦倒。此后西克斯德又極力慫恿外甥基罗拉莫·利阿利欧无恶不作。西克斯德給自己的侄子若望·罗維尔說了一門很好的親事，并把辛尼加利亞和孟多維兩地封与他作为基业。西克斯德为自己的甥侄真是費尽心机了。然而正当他醉心于“世俗虛偽的榮華富貴”的時候，死亡却來扣門了。布尔沙尔神父在1484年8月12日的日記中这样写道：

“今夜五點，我們的至聖聖父西克斯德4世与世長辭了，願天主憐憫他，收其靈魂啊們！”随后他又把西克斯德死后，发生在“教皇”宮中的一幕悲喜劇給我們描繪出來。

西克斯德的死信方才傳出，轉瞬之間，“教皇”宮中就亂成了一團，不分主教、神父、“教皇”侍衛以及大小官員，都在不要命地搶奪教皇宮中所有的一切陳設用具。及至布尔沙尔神父要料理西克斯德的

后事的時候，宮中已是四壁空空，有如懸磬。老神父用一塊破舊的地毯挂在門口給死者洗身，但找遍整個“教皇”宮，連一把水壺都找不見，只好把廚房里洗食具的大盆搬來使用。好歹把死尸洗完，又找不到毛巾來擦干……那些神父主教大人們只給西克斯德留下了一件千瘡百孔的長袍，連教皇的鞋子都給搶走了，幸而賽尔維亞主教送來一雙拖鞋，才算沒有赤腳入殮。西克斯德生前窮極豪華，食必山珍海味，衣必綾羅綢緞，作夢也不會想到死后會如此悽涼吧。然而“教權派”的典型代表魯易·巴斯德在他的教皇歷史里面却这样写道：“教皇在死前四日領了聖體；死后，小兄弟會听告解的神父为之洗身，將遺體放在担架上供群眾瞻仰。及晚，尸体被運往聖伯多祿大殿，完全按教皇礼仪葬埋……喪礼先后共舉行了九日之久。

”巴斯德隨即注明此系雅伯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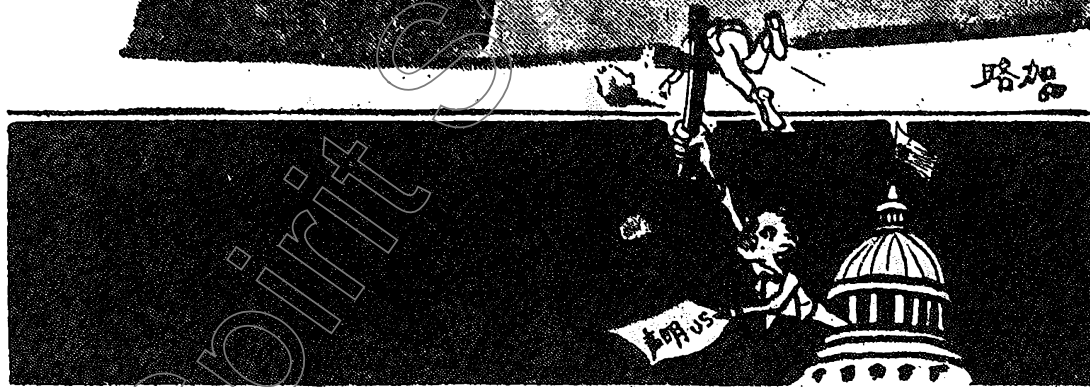
(下轉第40頁)

抵赖不了!

赫脱：华理柱是无辜的美国公民……
他的唯一使命是宗教性的……



中国人民日报



路加作

封面：詩配畫——选自“红旗歌謠”

(新华社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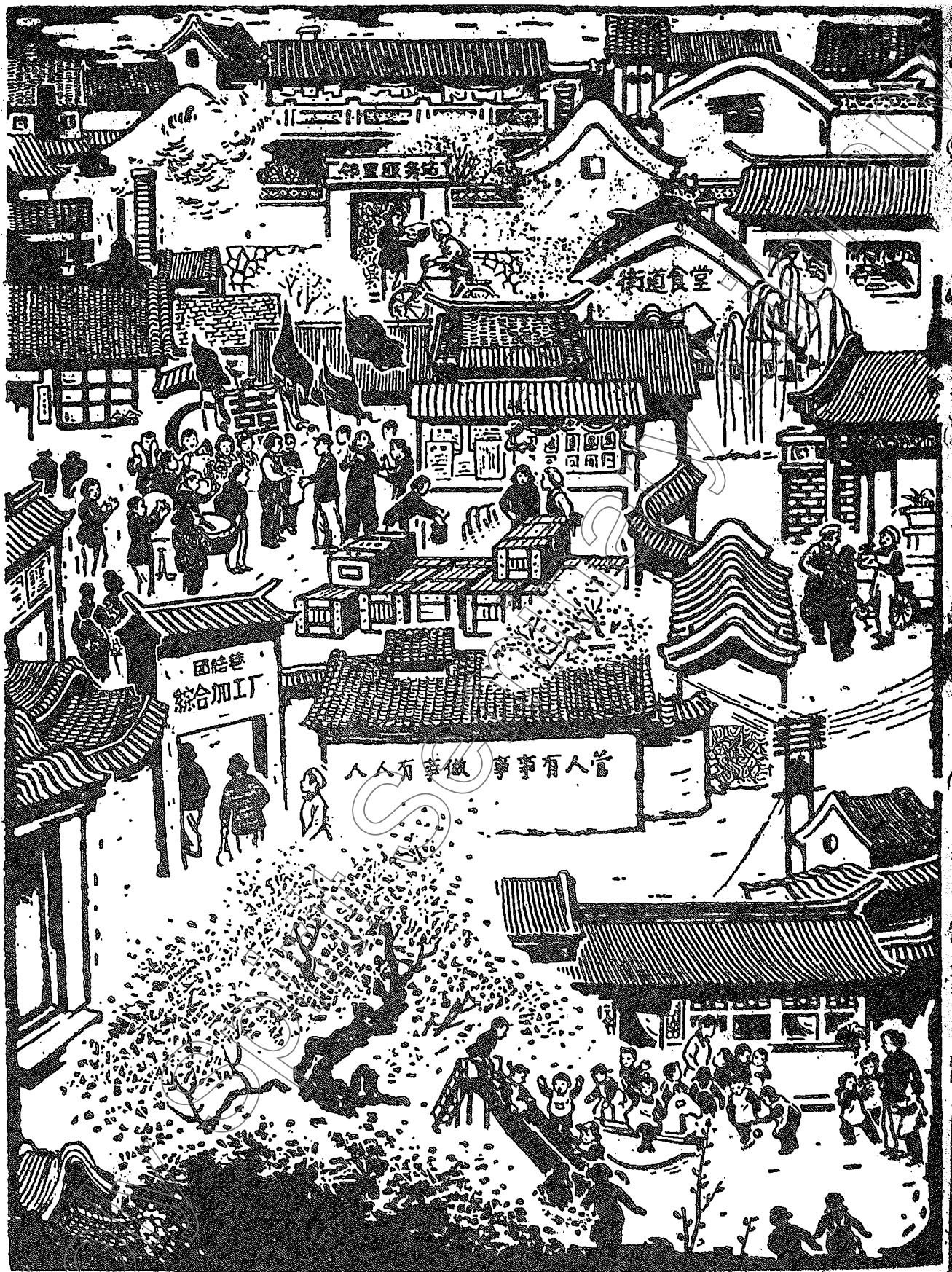
(米谷作畫)

好不过人民当了家

武山的大米兰州的瓜，
疼不过老子爱不过她，
亲不过咱们的共产党，
好不过人民当了家。

牡丹花开像绣球，
石榴花开结子稠；
向日葵朝着太阳转，
人民跟着共产党走。

高山上松柏扎根深，
叶叶儿四季常青青；
共产党一心为人民，
日子越过越称心。



热烈欢呼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